企业家日报
ENTREPRENEURS' DAILY

经济学家

学术支持：
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研究中心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改革和发展研究院

第 216 期（总第 322 期） 2017 年 8 月 18 日 星期五 投稿邮箱：jjxjzb@163.com 本刊订阅方法：网易“云阅读”搜索“经济学家周报”即可订阅。 本报所刊载文章系作者观点，均不代表本报意见

“影响中国发展的经济学家”之二

影响中国农村经济的经济学家

■ 白卫星 《经济学家周报》副主编

> 从理论贡献和农村实际效果看，杜润生（1913—2015）是影响影响中国农村经济的第一人。在杜润生影响下，一批经济学家参与了农村经济改革的实践与理论创新。

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历史看，经济学家或多或少影响着农村经济。从 1978 年开始的农村经济改革看，一批经济学家的重要作用非常明显。他们立足中国农村实际，致力探索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经济理论。从中央历年出台的农村政策看，总有经济学家的“影子”，他们提出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产业化、农村土地制度建设、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的理论观点与政策主张，始终伴随着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从理论贡献和农村实际效果看，杜润生（1913—2015）是影响影响中国农村经济的第一人。在杜润生影响下，一批经济学家参与了农村经济改革的实践与理论创新。

1982 年春，国家农委撤销，成立了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杜润生任主任，吴象（1922—）是副主任之一。吴象在杜润生的领导下工作了 10 多年。1995 年他们又“落户”于农业部离休。吴象曾经协助万里在安徽推动改革，后协助杜润生制定五个“一号文件”，先后出版了《阳光道与独木桥》《昔阳到凤阳》《中国农村改革实录》等著述，不遗余力地推进中国农村改革，为我国农村改革作出过有益的贡献。

王贵宸（1929—）是涉及包产到户理论的先行研究者之一。1977 年 5 月，王贵宸转入中国社科院农经所工作，先后任副所长、所长，出版了具有较强影响力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革新论》等著作。1979 年 5 月，王贵宸与魏道南合作写出了《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是一种好办法》，文章说：联系产量责任制是目前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实行的一项生产责任制度的具体办法，其特点是把生产责任制与劳动的最终成果联系起来，更适应农业生产的特点，有较大的优越性。文章表示，联系产量的责任制，既可以联系产量到组，也可以联系产量到人——实际上认为可以包产到户。这篇文章在《农业经济问题》创刊号上发表，后来获得了 1984 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他还写了《论包产到户》《专业承包联产计酬制的几个问题》《论专业承包联产责任制》等文章。1982—1983 年，王贵宸又与人合写了《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建立和发展》一书，比较系统全面地总结了以家庭经营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制。王贵宸的这些探索，对促进农村改革起了积极作用。

王耕今（1911—2007）曾任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临时领导小组顾问，为后来在农村改革中做出重要贡献的一批年轻人集聚在农村发展所内，形成强有力的研究智库，做了许多实际工作。1980—1985 年，作为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会刊《农业经济问题》的总编辑，王耕今组织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结构调整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使《农业经济问题》成为当时农业经济理论拨乱返正和宣传农村经济改革的主要阵地。他的这些努力，对农村改革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王耕今组织编写的《乡村三十年》，真实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安徽省凤阳县农村 30 多年社会经济发展变化，被学术界誉为了解我国农村发展的一部重要的参考书。此外，他还研究农业生态经济问题，为推动生态经济研究做出了贡献。

詹武（1921—2014）于 1978—1987 年在农业经济研究所、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和国家体改委担任领导工作。他一边辛勤工作，一边勤奋笔耕，《完整地执行农林牧副渔并举的方针》《中国农业的现代化道路》等文章对中央领导层决策产生了较大影响。

王叔云（1923—2002）在农经学界首先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农业宏观经济管理学的问题。王叔云认为，农业经济作为部门经济之一，属于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宏观经济的一个重要层次，有必要相应建立农业宏观经济学和农业宏观经济管理学。对农业现代化问题，王叔云认为，农业现代化指的是当代农业生产力发展状况和已经达到的水平，是一个农业生产能力大小、高低、先进或落后的标志，是一个属于生产力的范畴。衡量我国农业现代化的主要标准，仍然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只要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为剩余劳动力安排出路，把两方面的工作结合起来进行，就能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的新路。王叔云关于农村经济发展的其他问题，都有独到见解。

周诚（1927—2014）一直从事农业经济与土地经济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是中国农业经济学术领域中的资深学者、中国土地经济学术界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周诚撰写的《农业扩大再生产》《按客观规律办农业》《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管理问题》《关于农业规模经营的几个问题》等论著曾在学术界引起较大的反响。他是我国第一本和第二本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的主要编写者之一，对该课程的教学和学科建设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夏振坤（1928—）致力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研究，围绕农村现代化转型问题阐述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他在《中国农业发展模式探讨》《绿色革命之路》等论著中提出的“三维农业”理论、“农工商一体化”、“城乡交融发展”等观点，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实践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牛若峰（1928—2015）是农业技术经济学奠基人之一。他一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研究农业技术经济到 20 世纪 90 年代研究农业产业化经营，研究揭示了国家工业进程中中国经济偏斜循环与农业曲折发展的周期规律性，开创了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理论，为促进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牛若峰多次参加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农业部和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关于农业改革与发展政策的讨论，对我国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严瑞珍（1929—）长期致力于农村经济研究，所主持的“中国农产品剪刀差研究”“反贫困中的市场与政府行为”“转轨时期中国农民行为与政府行为轨迹”等大型研究项目，成果丰富，影响广泛。他首次提出把剪刀差划分为比价和比值剪刀差，并采用把工农业劳动力折合为标准劳动力的方法来计算剪刀差；首次提出了工农业互相支持、协调发展是处理我国工农业关系的唯一正确的方针，而不是所谓的“先以农补工，然后工业反哺农业”等。同时，他把中国农村改革的声音传向世界农业经济学界，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影响颇深。

陈吉元（1934—2003）在乡镇企业、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农业产业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金融、农民收入、粮食问题、邓小平农业思想等问题上，都进行了深入研究。陈吉元常年深入贫困农村地区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写出了许多具有理论水平及实际价值的论文和研究报告，对党和政府制定有关农村发展的一系列政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张晓山（1947—）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农村组织与制度及合作经济理论与实践。除了一系列论文和专著外，他主编的《新中国农村 60 年的发展与变迁》是集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全所之力撰写的一本全景式论文集，在研究农村改革的国内学术理论界广有影响。

陈锡文（1950—）长期从事农村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一直是中国制定农村政策的参与者之一，参与起草了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的大部分关于农业和农村政策的中央文件以及国家“十一五”规划编撰的组织、协调和起草工作。由于陈锡文在我国农业与农村政策研究及决策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加之长期供职的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是中共中央领导农村工作、农业经济的议事协调机构，使得陈锡文在农村、农业经济工作领域等重大问题的决策上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温铁军（1951—）长期关注农村，研究农村。他的“三农”情结和责任感，写出的《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的认识误区》《当“三农”遭遇 WTO》《半个世纪农村制度的变迁》等研究成果自然影响了农村政策的走向。

朱玲（1951—）注重对农村贫困群体、农民工、妇女和少数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状况进行追踪调查，研究了农村经济改革对农户经济安全的影响、减贫政策、农村居民和农民工养老保障等课题，是影响农村发展的女性经济学家。

杜鹰（1952—）长期从事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政策、理论研究、参与政策制定。他从 1989 年开始参与农村改革试验区组织协调工作，研究领域涉及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建设、金融、财税体制改革、农村基层经济组织建设、小城镇发展、扶贫、农业产业化经营等。鉴于他曾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他对农村经济的学术影响非同寻常。

柯炳生（1955—）主要从事农业市场政策与农产品国际贸易、农业市场与价格政策、粮食问题和农民收入问题等课题的研究，较早提出了中国乡镇企业发展的区域差异性和实行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问题，参与了农业部等部门组织的农村经济调查和农业价格政策改革建议工作，中国农业大学校长的身份，更增添了他在农村经济领域的影响。

马晓河（1955—）是农业农村改革推动者之一，也是新时期主张改革需要顶层设计的知名专家。马晓河在本世纪初提出应在全国普遍实行免除农业税政策，指出农村公共物品与城市公共物品具有同一属性，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应由以农民为主转向以政府为主，这些都对农村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蔡昉（1956—）从 1980 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的热点入手，通过把最现实的问题与一系列发展经济学的主题联系起来；或者说从具体的问题研究起，逐渐形成自己对农业和农村的经济学理解，是他从事经济研究的基本脉络。他情系三农，却竭力反对农业保护政策。他写的《比较优势与农业发展政策》《中国农业的转折点》逐渐成为学界共识，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比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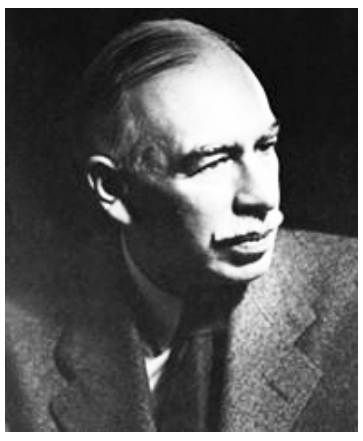
韩俊（1963—）长期从事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著有《调查中国农村》《中国县乡财政与农民负担问题研究》《中国新农村建设调查》《我国食物生产能力与供求平衡战略研究》等。他参加过党中央、国务院一些文件的起草工作。他现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是经济学界不多的“60 后”经济学家，是目前影响农村经济的高层人物之一。

除了以上 20 位经济学家外，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对农村经济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何廉**（1895—1975）是我国最早重视农业经济研究的经济学家，**张心一**（1897—1992）是我国农业统计学的奠基人，**陈翰笙**（1897—2004）上世纪 30 年代的农村经济调查，**黄松龄**（1898—1972）强调农林牧副渔结合、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思想，都对中国农村发展和农村经济学有重要的学术贡献。另外，**乔启明**（1897—1970）、**董时进**（1900—1984）、**张锡昌**（1902—1980）、**方显廷**（1903—1958）、**姜君辰**（1904—1985）、**韩德章**（1905-1988）、**钱俊瑞**（1908—1985）等对农村经济研究都有相当高的学术造诣。

从纵向看，何廉、陈翰笙、方显廷、董时进等对建国前的农村经济有一定影响，黄松龄、张心一、乔启明、姜君辰等对上世纪 50—60 年代的农村经济有影响，杜润生、吴象、王贵宸、陈吉元等对 1978 年后的农村改革起了中流砥柱的影响作用，陈锡文、杜鹰、张晓山、蔡昉等则深刻影响了新世纪以来的农村发展。这些农村经济学家为了了解农村，掌握农民心声，他们跋山涉水，丈量大地，足绘地图，农村调研的传统从上世纪 30 年代一直延续到今天。农村巨变的背后有经济学家调研的足迹，他们的理论观点伴随着调研足迹传向农村的每一个角落，对农村经济的影响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凯恩斯“可思议”

■ 本力



●凯恩斯可思议

> 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框架中，目标是多维度的。他坚定指出，要使一个经济体达到均衡状态，则若干个市场就必须处于均衡状态。这本身就是对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古典经济学的发展，也是从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的重大突破。

凯恩斯堪称对中国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凯恩斯革命”开创了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并被冠以“凯恩斯主义”。他为后学者仰慕的地方不少，但有两点常为人诟病：其一是没有获得过经济学的学位，其二是主张政府干预经济。或许正是这种门户之见或误解，许多人对他的经济思想了解不够客观、深入，甚至排斥。

因此，麻省理工学院荣休教授彼得·特明与牛津大学经济学教授戴维·瓦因斯撰写的这本《凯恩斯思想小史：繁荣的钥匙》就显得格外特别。一方面，正如书名所示，这是一部简要的经济思想史，但它却对凯恩斯的理论源流、来龙去脉梳理得颇为全面、精到。另一方面，得益于问题导向的叙述方式，该书从凯恩斯面对的问题入手，从经济决策的角度去理解其经济思想。

与马克思相若，凯恩斯也身处在资本主义带来的史无前例的繁荣发展和重大危机中。或者说，他们本身都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重大病症应运而生。只是相对而言，凯恩斯做过公务员和财政部顾问，更加熟悉体制以及与政府、社会组织等各方面合作，且彼时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一变化首先是国际化进程，以及“一战”之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其次是技术和产业的突飞猛进。其实当今世界经济秩序的巨变和重大问题，仍然不外乎受这两个最重要的趋势影响，无非是更加剧烈、迅速。所以，正如该书作者所言：简单的凯恩斯分析工具就能阐明当今世界的主要宏观问题。

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框架中，目标是多维度的。他坚定指出，要使一个经济体达到均衡状态，则若干个市场就必须处于均衡状态。这本身就是对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古典经济学的发展，也是从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的重大突破。正如书中所指出的，这源于他对经济危机中现实问题的回应。

凯恩斯最初的重大理论创新主要始于 1930 年麦克米伦委员会提出的两个问题：一是金本位体制下如何保持外部平衡；二是如何解决国内平衡问题，即失业问题。前一个问题的最终结果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创建以及若干年后斯旺示意图的诞生，后一个问题的直接研究成果就是人们熟知的《就业、利息或货币通论》(下称《通论》)。

《通论》与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比肩，为经济学经典书目首选，但由于晦涩难懂，也被认为是“天书”而不可思议。对于理解这本经典之作，《凯恩斯思想小史：繁荣的钥匙》一书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简要的思路。根据书中所述，在 1929 年“大萧条”之后的严峻经济危机中，凯恩斯从放弃灵活可变的价格，转而调整为更接近真实情况的“黏性价格”入手，果断地从休谟、马歇尔等的货币数量论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传统中走出，在《通论》中作了三个重要的创新：消费函数、资本边际效率、流动性偏好，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构建了系统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这完全是宏观分析的个人心理、行为的微观基础，也是让凯恩斯经济学“可思议”的重要起点。其实，即使现在大行其道的行为金融学也可追溯至凯恩斯，他对投资提出的“选股如选美”等直至今日仍然为人称道。

坦率地讲，笔者在研习经济学的过程中，也有重微观、轻宏观的古典主义情结，甚至常常觉得宏观经济学缺乏微观经济学那种“先验”的理论美感。然而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对此已大为改观，尤其是通读这本小册子更让人清醒地理解到凯恩斯对人性的洞察和其背后的人文关怀。

不知道是否与父亲是伦理学教授有关，凯恩斯终其一生保持了对哲学、艺术的高度兴趣，他的研究和社会实践中也完整体现了其人文关怀和伦理观。除了“节俭悖论”、“动物精神”这种对道德直觉的冷静而显现的智慧，凯恩斯对功利主义的态度也具有强烈的批判和超越精神，他接受功利主义的进步性，但自信已摆脱功利主义的束缚，甚至认为恰恰是功利主义在蚕食现代文明、败坏道德，破坏大众的理想。

按照凯恩斯经济思想研究专家李井奎教授的说法，在他的经济学体系中，让国家和私人在经济决策中做如下分工：国家决定总的供求平衡，保证充分就业，私人去解决个别商品的供求平衡；由国家决定总产量，由“看不见的手”去决定总产量的具体构成。

凯恩斯还长期致力于国家之间的合作，他对世界秩序的重建和持续繁荣，包括当前全球“长期和平”的局面都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凯恩斯挽救了上个世纪那场严峻的危机，也为经济学家带来了荣耀。与他合作或追随他事业的希克斯、米德、索洛等众多经济学家纷纷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凯恩斯由研究失业而登堂入室，他曾说，经济学不一定能够让你不失业，但可以让你知道为什么失业。然而事实上，如今政府部门和众多金融机构的经济学家、宏观分析师们的大量工作机会也可以说是拜凯恩斯所赐。如此说来，人们就更应该多读读凯恩斯了。